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50

公共社交领域的转移、身份构建与认同

——中国贵州黔东南苗族村落社交媒体使用研究

文珣同¹

(¹ 宁波诺丁汉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浙江宁波, 315100)

摘要: 随着社交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通讯设备的普及, 较为封闭的苗族村落也逐渐融入了更广泛的信息网络。社交媒体的普及不仅为苗族提供了丰富的外部资讯, 还在无形中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模式。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 采用田野调查方法, 深入了解社交媒体的普及与使用对苗族带来的各种影响。研究发现, 社交媒体改变了苗族传统的社交空间, 同时也使得苗族传统习俗中的文化内核逐渐消失。另外, 苗族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而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 导致他们民族文化的自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然而, 社交媒体在给苗族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 也为苗族人搭建了一个新的“精神社区”, 这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苗族人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研究旨在增强社会大众对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关注, 强调在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双刃剑, 既能推动文化传播和创新, 也可能带来文化的弱化和丧失。因此, 如何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寻找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 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新闻传播; 社交媒体; 苗族文化; 公共社交; 身份认同

引言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 社交媒体广泛渗透到生活中, 学者们从受众身份认同、使用行为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在中国, 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也受到关注。苗族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 因历史上未保存文字, 其文化主要通过口耳相传或传统节日、祭祀等方式传承^[1]。但是, 随着新城镇化和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苗族人与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 同时苗族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也更加频繁深入, 这导致外来文化给苗族传统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苗族人也逐渐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认同。在这样独特的苗族文化语境下, 社交媒体的使用对苗族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值得我们关注。

一、苗族人的传统公共社交领域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公共领域理论, 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社会空间^[2]。咖啡厅、广场、剧院、学校等都是传统的公共领域, 人们在其中进行社交, 形成社交空间。现如今, 网络及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出现, 既成为了公共领域中的媒介, 同时也搭建了一个新的虚拟的公共空间。相较于有着较为多样社交空间的都市人, 村寨里的苗族人有自己较为集中的传统社交领域。

报德村位于贵州省雷山县城西北面, 全村有 200 多户, 分为 3 个自然寨、共有 15 个小组^[3]。报德村全村面积并不大, 由于长期信息闭塞和通讯技术发展落后, 导致人们对媒介的接触整体起步都比较晚, 所以

[作者简介]

文珣同 (1995-), 男, 贵州凯里人, 宁波诺丁汉大学, 硕士研究生。

长期以来老一辈的苗族人都保持着传统的社交方式，苗族村落内村民们更钟情于面对面的口头传播的交流方式，苗族家庭之间的联系基本上也都是靠走访串门。美国学者哈特在“媒介系统论”中提出“示现的媒介系统”，指人们通过自身身体表达传递信息。在口语传播中，信息由一个身体发出，并被另一个身体接收，传播行为通过身体完成。这个系统没有符号意义的转移或物质流动，传播过程是身体生物功能的“示现”，即通过身体器官发出、体验、理解和记忆语言^[4]。所以透过口口相传的语言、眼神和肢体语言等进行交流的媒介系统，它自发、亲近、便捷，也更真实、直接、感性，并且充满了体温的生动。这便是苗族长期以来使用并且直到现在依然倾向的沟通方式。口语传播的方式虽然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但依然成为村民内部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有几个原因：其一，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数量多，密度大，而且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为凝聚型分布^[5]。报德村就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村落，其面积狭窄，村民居住紧凑，以及长久以来由于通讯技术发展落后，使得村民更愿意以走访串门的方式传递信息。其二，由于长期生活在经济和教育落后的山区，苗族老一辈未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导致整体文化程度较低，且学习和使用汉语的机会有限。因此，传统苗族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使用苗语交流^[6]。同时因为苗语没有文字，只通过口口相传，所以这一语言特性决定了传统的苗族老人更愿意采取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而非其他文字形式；其三，苗族独特的氏族群居方式使得家庭之间联系紧密，村民关系亲近。面对面互动、相互串门、喝酒和集体农作成为苗族老人感情维系的重要手段^[7]。时至今日，无论是村中会议还是人际交往中的聚会邀请，面对面的告知依然是报德村老一辈苗族老人最高效和便捷的方式。他们始终认为这种附着在身体的口语传播方式充满了自然性，并从中散发出自然而然的真实、感性与亲近。基于村民们这样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集会”就成为苗族老人社交与信息传递的最佳途径，并成为苗族老人特有的公共社交空间。

“跳芦笙舞”是苗族老人最为重要的社交方式，“芦笙场”自然而然也就成为苗族老人交换信息的重要空间。“芦笙场”一直以来都是苗族老人极为重要的传统社交场所，它既是苗族男女爱情的见证，也是苗族老人自我保护的手段。芦笙是苗族特有的簧管乐器，常用于伴奏芦笙舞。芦笙舞是以男子边吹芦笙边舞动下肢为特征的传统民间舞蹈，除祭祀活动外，还在婚礼、丧葬和新屋落成时跳^[8]。每逢苗族传统节日和男女青年进行传统社交活动时，男生便吹芦笙，女生跳芦笙舞。苗族人的害羞文化使得他们对待男女关系也十分谨慎，不会直接在长辈面前手拉手谈情说爱，传统的苗族老人基本的社交行为便是在“芦笙场”上完成。因此，跳芦笙舞对于苗族老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存在和象征，这个活动也将苗族老人相互联系起来，成了他们重要的社交方式。对于长久信息闭塞的苗族老人来说，传统的公共社交领域（跳芦笙舞）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面对面的口语传播也不可替代。因为较为弱势的苗族老人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山区，以及苗族老人较强的家族观念，使得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向内聚集的意愿，无论是从自然环境上、民族文化上，还是合作式的生产方式或经济来源上都在不断加深这种聚合观念。因此，苗族老人对于公共领域中聚集行为的重视与依赖则是他们聚集心理的外部呈现。

二、微信群——苗族老人新的社交公共领域

社交媒体等网络媒介为人们的社交交往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社交空间，在这里有与“芦笙场”类似的社交公共领域，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更新状态，也有一对一的私密传播领域，如微信的私信聊天功能^[9]。同时，人们在社交媒体中可以突破“一对一”的聊天方式，将其范围扩大到“群组”的形式，实现多人同时沟通。长久以来，地理临近性是社交关系约束机制的主导因素之一，然而社交媒体对空间的打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逐渐消亡^[10]。这种新平台的建立使得人们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延伸到社交媒体中，将互动从现实空间平移到社交媒体的虚拟空间，让彼此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从而得到更高效和高频率的互动。

如今，苗族青年们和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社交媒体更加便利地进行社交活动，然而社交媒体中社交的空间结构也反过来对苗族青年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现实社会的组织形态。基于“害羞”的道德标准，老一辈的苗族老人在生活中产生了“跳芦笙舞”的社交风俗。这些独特的习俗是苗族文化对外呈现的文化符号，也是作为老一辈苗族老人社交方式的呈现形式和载体，同时还利于传播苗族文化。苗族老人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些习俗，在社交媒体普及之后都受到巨大的影响。微信等社交媒体可以随时随地形成个人私密空间，导致为了维护“害羞”所建立起来的习俗受到冲击。“跳芦笙舞”这一苗族文化符号随着其使用价值的消减，在年轻的苗族老人心中的文化意义也逐渐淡化。

“虚拟社区”概念，指的是网络虚拟空间中进行的互动。虚拟社区包括公共讨论，如分享观点、知识或情感，个体与他人或群体进行交流，并在此过程中持续发展人际关系^[11]。在虚拟社区中也同样存在着社会角色和社会等级，每一个在虚拟社区中的成员都拥有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相同的民族、兴趣爱好、行为主张等将虚拟的个体在社区中聚集，在这里会激发个体之间产生相似的价值认同。社交媒体在为年轻苗族

人提供全新的私人领域的同时，也搭建起了将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公共领域——“微信群”。微信群的出现增强了年轻一代苗族之间感情的联系，也加深了集体的认同与团结，同时也成为报德村中年轻一代苗族凝聚集体意识、维系本族文化的新社交公共领域。

在过去，村中有什么事情，都选择挨家串门或者把村民聚集起来一起告知，而社交媒体中“群组”的出现可以让信息被快速统一地传递。虽然对于活动范围较小的报德村，老一代的苗族依然习惯于通过开会聚集的形式传递信息，但对于年轻的苗族来说，“群组”的出现提供了更快速且有效的交流方式。近年来，报德村的旅游开发吸引了大量游客，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们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包括对环境的破坏、不文明的旅游现象等。这对于长久以来生活环境都较为封闭且缺少旅游管理应对经验的苗族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微信群组”的建立将苗族聚集在同一空间内，在遇到问题和突发事件时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发布在“群组”中，得以让大家掌握最新情况并一起商量应对的方案。在微信群中，除了日常的互动，发布的内容更多是一些村内事务的通知和关于周边村落的要闻，微信群给年轻一代的苗族提供了通知、召集、提醒的便捷功能。社交媒体将在同一利益共同体中的村民聚集在一个场所，共同面对旅游开发中的种种问题，在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报德村苗族青年们逐渐依赖这一高效、便捷的信息传递方式。同时，他们在社交平台中形成了一个小社会。随着大量游客的涌入，村民会遇到很多由于不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和质疑，在面对苗族文化宣传、环境保护等问题时，大家会将网络平台上有价值的新闻、文章和个人见解发送在微信群组中互相交流，并从网络上相关的事件和案例中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经验。这种集体空间中的互动，不仅解答了报德村年轻一代苗族面对旅游业发展中遇到的困惑，同时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认同感。

由于外界对神秘的苗族文化存在一些误解和质疑，使苗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苗族急需得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身份的认同，而社交媒体为其提供了绝佳的平台，苗族将现实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延伸到这一精神社区中，他们在这里积极发声、表达态度。不同于苗族传统的公共领域，社交媒体的公共领域既给苗族创造了具有归属感的精神社区，又提供了去中心化的互动方式，将话语权分散给每一名成员，这种权力的分散激发了苗族自由积极地在虚拟社区中表达意见，帮助其他成员解决问题的行为，使得苗族人在这一场景下的凝聚力和自豪感越来越强。

“精神社区”即在这个社区中的成员，虽然成员分散在不同的地域，但是他们拥有同一种情感、同一种信仰追求，使他们相互之间保持着同一种强烈的、内聚的社会网络，从而形成心理上或者精神上的共同体。因而他们更强调精神和文化上的维系，在这“想象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所以在“精神社区”中，社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真正的本质是社区中的“精神”，社区内部成员的意识才是社区发展的核心因素^[12]。

三、社交媒体中苗族自我身份的构建与认同

身份认同是个体在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属群体的认知，与之相伴的是情感上的体验以及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它既是对自己所在的群体共同性的肯定，也是与其他群体差异的区分。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关键符号，也是民族身份的具体体现，这其中包括了价值观、伦理道德、艺术、风俗等^[13]。社交媒体的图文结合、音影并用的多元传播模式让长久闭塞的苗族更直观地看到外面的世界与其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使其形成对比之后，苗族人也产生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在社交媒体中，年轻一代的苗族积极使用微信群组转发关于苗族文化的文章，正是他们凝聚集体意识和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在过去通讯闭塞的时期，老一辈的苗族很少有机会与外界的其他民族接触并形成对比，因此也难以形成强大的民族认同感。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年轻一代的苗族迅速地接触到其他民族的文化，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文化习俗，苗族人都意识到自身拥有的独特性，因此苗族人的身份认同感迅速增加，并使得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凝聚力更强。在微信社交媒体的群组中，年轻一代的苗族自己形成了一个小社会，这里成为了苗族新的“想象共同体”，在这其中，这种精神上的团结激发了苗族人的归属感和存在感，形成了新的网络群体。在社交媒体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选择发表不同的言论，由于偏好、民族等方面的趋同，使得在社交媒体中更容易产生“群体集化”的现象。共同的民族特征使他们对同一事件的关注度更高，言论也更一致。社交媒体的弱控制性使得网络群体在高度一致性的情景下产生一种价值感的认同^[14]。

社交媒体的出现让苗族人与外界主流社会有了更多交往，通过这些媒体他们接触到外界的各种政治、娱乐等海量信息，我们往往认为这些信息会对生活在大山里的苗族带来巨大的冲击，使苗族人的文化认同感被消减。但事实是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苗族得以类聚，在共同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过程中又建立了新

的身份认同的共同体，并因此增强了自我的民族认同意识，社交媒体成为了苗族身份认同的粘合剂，民族凝聚力的催化剂。

民族文化与心理认同是通过一定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道德标准以及文化产品得以表现^[15]。但是社交媒体的入侵使得传统苗族村寨里的民族文化在对外呈现的过程中，民族的文化内核逐渐消失或是受到主流文化不同程度的同化。伴随着文化风俗的变形甚至是消失，短暂激发出的苗族人的心理认同感恐怕难以长久延续，所以对于文化载体的维护更利于苗族人的身份认同感的增强。

如今，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型公共空间。社交媒体在为人们提供海量的信息时，也成为了塑造人们想法观念、改变人们对文化和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力量^[16]。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年轻一代苗族普遍依赖社交媒体进行日常交流和获取信息，成为社交媒体使用的主要群体，虽然传统的苗族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仍处于初级的起步阶段，但是社交平台上大量的信息已经为苗族人的生活带来改变。尽管如此，保守的苗族对于社交媒体的态度依然很谨慎。由于苗族长期生活在单纯和睦的环境中，加之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因此他们对于网络诈骗等事件的辨别能力不强，出于这种担心，年纪较大的苗族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仍处于浏览多于互动的浅层阶段。

四、结语

文章基于传播学视角，从社交空间、身份构建与认同方面探索了社交媒体对苗族人的影响和对其文化的冲击。这些冲击实际上是对苗族传统社交空间的转变，也是对苗族文化边界的打破。社交媒体的使用为年轻一代苗族提供了新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其中在虚拟公共领域中，“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让苗族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微信等社交媒体所提供的“个人私密领域”则模糊了苗族男女“跳芦笙舞”的传统联系互动方式。年轻一代苗族逐渐倾向且依赖社交媒体提供的便捷交流方式，使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跳芦笙舞”背后的文化内涵被消弱。“跳芦笙舞”不再是充满传统文化内涵的少数民族特有的行为方式，而是变成一种为了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商业表演。这种苗族文化符号的淡化使得苗族文化边界受到冲击而逐渐模糊，这对苗族传统文化来说是极大的伤害。社交媒体为原始民族部落打开连通世界的通道，让主流社会的体系和价值观通过社交媒体传递到苗族村寨，一方面让苗族文化中的传统习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袭，另一方面也唤醒了苗族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

参考文献：

- [1]吴正彪.苗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及苗文推广普及的困境与出路管窥[J].文山学院学报,2012,25(1):73-77.
- [2]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 王晓珏,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94.
- [3] 百度百科.(2024). 报德村. 百度百科. [2024-9-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A5%E5%BE%B7%E6%9D%91/15885247>
- [4]陈翔.论媒介系统与身体之关系——基于 A·哈特的“媒介系统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9):159-162.
- [5]谢鹏,张扬.基于 GIS 的贵州省民族村寨空间分布格局[J].数字化用户,2020(33):133-135
- [6]陈沛照.从一个苗族村落的教育民族志反思中国边远民族地区教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10):13-19.
- [7]温士贤.流动中的家与社会:一个苗族家庭的迁徙史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8,39(8):43-49
- [8]钱应华.苗族“芦笙舞”引入高职高专院校体育课程的探讨[J].体育科技,2012,33(03):136-138.
- [9]苗珊珊,吴曦,许增巍.数字治理新实践:虚拟公共空间何以促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基于乡村微信群的实证分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1):23-34.
- [10]黄鑫楠,孙斌栋,张婷麟.地理距离对互联网社会中网络信息传播的影响[J].地理学报,2020,75(4):722-735
- [11] 王思斌. 社会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69.
- [12]赵利生,马志强.精神社区及其现实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2019,(02):86-93.
- [13]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5(01):21-27.
- [14]信鸽.网络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J].巢湖学院学报,2010,12(1):35-38.
- [15] 肖玲聪, 崔海亮.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心理研究[J]. 理论探讨, 2022(2): 1-12.
- [16]袁靖华.微博的理想与现实——兼论社交媒体建构公共空间的三大困扰因素[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5(6):20-25

Transfer,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Identity in Public Social Spheres --A Study of Social Media Use in Miao Villages in Southeast Guizhou, China

Yutong W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315100)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devices, the more closed Hmong villages have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a wider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 media not only provides the Miao people with rich external information, but also changes their lifestyle and socialization patterns in an invisible 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dopts a field research method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ious impacts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and use of social media have brought to the Miao people. It is found that social media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pace of the Miao peo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caused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cultural kernel customs in the traditional Hmong practice. In addition, Hmong people have been exposed to different cultures and values through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which has led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changes in their nation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However, while social media have impacted Hmong culture, they have also created a new “spiritual community” for Hmong people, which to a large extent has strengthened their identity and cohesion. The study aims to enhance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ethnic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mphasiz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as a double-edged sword, can promot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innovation, but may also bring about cultural weakening and loss. Therefore, how to find a modern way of passing on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Keywords: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Hmong culture; public socialization; identity